

转型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追求的困境及其批判

张秀勤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江苏无锡 214121)

摘要: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存在两个向度:一个指向人类的终极关怀,另一指向中国当下的现实关怀。实践中,民众更关注终极关怀的现实利好。这决定了转型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追求面临的困境:意识形态上,要理论自觉自信,同时要应对非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责难;个体存在上要面对现代性问题。在历史逻辑中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在日常生活批判中葆有精神追求的超越性,是解决精神懈怠问题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转型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追求

中图分类号: D64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4970(2014)01-0025-05

精神追求是指主体根据自身精神需要确立人生奋斗目标,并理解、认同、享受目标实现的过程。从结构上讲,精神追求主要包括追求的目标、实现目标所需要的意志品质(这决定主体抗干扰和克服困难能力)以及在目标实现过程中所形成的精神气质(这里指主体在精神追求过程中衍生出来的精神状态)。精神追求是主体生命激情的投入,其必然呈现在社会生产实践和日常生活中,表现为超越直观、经验,意志坚决,内在丰富。精神追求的价值在于对主体行为和意识产生感召和引导作用。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是指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理想信念和服务宗旨在其精神领域中的体现,一般包括以共产主义社会理想为对象的精神追求和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精神追求。前者是指终极层面上的精神追求,后者指现实层面的精神追求,二者统一于社会实践。

“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1] 50},这是党的十八大报告对全体党员提出的明确要求。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和精神追求是什么?如何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中国共产党人的这种角色的双重性即党员角色和生存着的人所带来的张力与焦虑如何克服?作为党员,他有信仰;作为生存着的人,在社会转型时期,他同样遭遇现代性的迷茫和困惑。笔者试图从这个角度分析转型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困境及其克服。

一、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追求的内在规定

1. 马克思主义经典创始人对共产党人精神追求的界定

马克思主义经典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直接对共产党人精神追求作出明确界定,但他们从利益观、意志品质、理论素养、批判精神及实践方法等角度对共产党人精神追求的相关问题作了阐述。利益观是精神追求的基点,直接决定精神追求的目标。马克思曾说“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因此,确立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首先要明确他们的利益观。早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共产党人同全体无产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3] 285}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经典创始人认为,共产党人的利益与无产阶级的利益一致,前者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换言之,满足无产阶级的利益需要应当成为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目标。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还对共产党人的意志品质、理论素养提出要求,“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3] 285}共产党人实践中应当表现出坚定和始终如一的态度和决心,并掌握无产阶

收稿日期:2013-12-28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13XT002);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级重点课题(BS2012-07)

作者简介:张秀勤(1975—),女,江苏宿迁人,讲师,博士,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

级运动理论。批判精神是共产党人保持其政治正确、坚守其精神追求不可或缺的精神武器,“在法国,共产党人同社会主义民主党联合起来反对保守的和激进的资产阶级,但是并不因此放弃对那些从革命的传统中承袭下来的空谈和幻想采取批判态度的权利。”^[306]可见,共产党人不仅进行现实的斗争,而且把批判作为一种武器,进行理论上斗争。马克思主义经典创始人从终极目标与现实运动结合起来的角 度,提出共产党人的实践方向,“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306]“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94]。

由此可见,在马克思主义经典创始人看来,实现共产主义,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应当成为共产党人毕生的精神追求,无产阶级利益观、坚强的意志品质、先觉的理论素养、批判精神以及把终极目标与现实运动结合起来的实践方向等,是共产党人坚守其精神追求的基本要求和有效保障。

2. 实践中积淀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追求

共产党人“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可见,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存在两个向度:一是指向人类的终极关怀向度,二是指向中国当下的现实向度。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是共产党人终极的精神追求。在不同历史条件下,这种终极精神追求有不同的现实指向,因而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集中体现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如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开路先锋的井冈山精神、革命英雄主义式的长征精神,革命乐观主义的延安精神。新中国成立之后,为摆脱积贫积弱的现状,在艰苦的条件下,产生了大庆精神、红旗渠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新时期,党对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新的要求,要做社会主义道德的示范者,诚信风尚的引领者,公平正义的维护者,发挥自己的人格力量,为社会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毛泽东曾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3]。邓小平为此反复强调,“在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多少人牺牲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4]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代表了一种积极向上的主流意识。

具体地说,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追求的主要表现在这几个方面:

(1) 坚定的理想信念

坚定的理想信念是精神追求的首义,决定主体的价值取向。理想信念是主体的思想观念的集芯片和总开关,在主体的精神世界中处于统摄地位,无论主体在何种生存环境下都能葆有对追求对象存在的敬畏和肯定。十八大报告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50]追求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的最核心部分。

(2) 深厚的民族精神

如果说追求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共产党人精神追求的共性,那么民族精神则是中国历史语境下的追求对象,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的现实性是对祖国对人民的深厚感情。热爱祖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是我们党坚定不移的根本宗旨,是中国共产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所在。邓小平曾动情地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正是凭着这种深厚的爱,带领我们党和人民敢闯敢改革,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3) 坚韧的意志品质

精神追求离不开意志品质的支撑,这里主要指投入到实现理想和信仰的实际行动中的意志力。意志力越强,主体精神追求越持久,意志力越弱,其精神追求持续时间越短。没有强大的意志力,就没有长征精神、“两弹一星”精神。邓小平“三落三起”的传奇人生,究其原因,主要是邓小平始终坚信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也正是这一理想信念造就了他坚强的革命品格和高尚的革命情怀。

(4) 积极的进取精神和主动的自我批判精神

这是主观世界的自我净化和提升必要的素质。精神追求的目标内在地决定主体要具有开放性与向上性。开放性是指主体保持与外界的良好互动关系所应具有的特性。向上性指精神追求必然要求主体要不断提升自身的境界和眼界以适应时代的变化。开放性和向上性决定了主体要不断突破自我既有的能力和不断更新自我的能力,吸纳有益成分厚实自我。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充分展现了积极进取精神和主动自我批判精神。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也没搞清楚,到创造性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到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觉自信,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积极进取精神和主动的自我批判精神。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出现,执政理念的转变,从本质上讲,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寻求自我突

破和自我更新的成果,是精神追求的新境界。

二、转型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追求面临的困境及其批判

中国社会转型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追求的时代背景,也是现实基础。“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257]。一方面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另一方面中国要走不同于西方的道路(对内剥削、对外侵略是西方道路的共性)。这决定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必然遭遇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是意识形态上,应对非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责难;二是作为转型时期的个体自身面对现代性的遭遇。

1. 意识形态上遭遇非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责难

对中国共产党人而言,坚守其理想信念,现实性表现就是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充满自信。自信来自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和遵循,来自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忠诚。一些人借中国发展中产生的问题来否定中国的成就,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道路、中国制度。另外,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无用论”、“中国崩溃论”、“普世价值论”等,轮番干扰中国共产党人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两种意识形态的对抗,折射出一部分中国共产党人信仰层面精神追求的不自足,主要表现为: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把握不彻底。就世界观而言,马克思主义通过唯物史观既实现了对上帝的祛魅,也实现了对“绝对精神”的祛魅,确立“每个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人类的终极关怀。但是一部分共产党人不信马列信鬼神,说明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不清。二是把理论上的学习、接受误认为是信仰上的接受。信仰的确立有其自身的规律,目前我们对信仰确立的理路认识不够清楚。总结五四时期共产党人的信仰理路,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至少通过这几个阶段:价值切入→多元思想交锋→实践检验,也就是从价值合理性和科学真理性角度认识、认同马克思主义,从多元思想交锋中转向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实践中成长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转型时期,部分共产党人对如何成长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搞不清楚。三是理论的不自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开放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性,需要不断地总结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经验并上升到理论高度。转型时期,现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不能

完全解释现实,有些理论还未完全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同。理论的说服力尚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理论信仰的魅力就不能充分彰显。

2. 转型时期个体自身面对现代性的遭遇

作为党员,中国共产党人有着坚定的信仰,作为个体生存着的人,转型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同样遭遇现代性的迷茫、困惑和物质诱惑,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

其一,物化的精神生活方式腐蚀着一部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的超越性。物化,马克思用它来批判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现在却腐蚀着转型时期人的精神生活。作为个体生存者的共产党人,转型时期,他们同样遭遇物化的问题。马克思认为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在物欲膨胀的时代,超越性丧失以及商品拜物教的盛行,导致现时代一些人精神生活的贫乏和低俗,感性迷失在种种非理性的快感体验之中。在这贫乏而低俗的物化方式包裹的处境中,作为个体共产党人的无私性和先进性不可避免地受到物化的影响。部分中国共产党人对权力、金钱的迷恋反映了他们不适应转型时期的精神生活样式。“在传统时代,物质生活的匮乏不仅没有限制、反而由此激发和成就了以自身完善为目的并主导着整个文化传统的超越性,这种超越性既支撑、同时也限制着传统时代的感性生活。在现时代,相对富裕的物质生活使得人们从总体上摆脱了物质匮乏,并使多样化的感性生活得以可能,但人们精神生活的丰富性及质量并没有得到提高;相反,随高技术、工业社会、后现代社会及消费社会裹挟而来的功利主义与物质主义,放逐、吞噬乃至取代了传统的精神超越性以及相应的真、善、美、理性、德性、神性等价值观念,并累积为主导整个现时代精神文化的拜物教意识。”^[258]一旦精神生活舍弃其自身的超越性,甘愿附魅于物化,部分中国共产党人丧失其精神生活的高尚性,陷入了非理性的快感体验及享乐主义困境中。

精神生活放任自己,走向各种物化、低俗和贫乏的感性化生活方式,这本身说明了个体自我价值实现愿望的意志力薄弱,也反映了转型时期人的生活境况。转型时期大多数人刚刚脱贫,但贫困阴影还在,先富起来之后,怎么样适应个别富有但仍有贫困者的生活?适应这种富有与贫困共存社会现状的和谐精神生活没有建立起来,多数人仍囿于求富、炫富、疑富(这里指怀疑财富来路不当、为富不仁的社会心理)的思维中。邓小平所设想的“先富带动后富”,在个体生活领域更多地表现为外在的道德要求,这种外在的道德要求远未能转向为内在的需求和追求。总而言之,转型时期与物质文明相对应的

精神文明滞后,“两手都要抓紧、两手都要硬”目前更多地还停留在理论和政策层面,而未能落实到社会大众实际行动上,或者说更多地还只是少数人的理论自觉,而未能转化为全体中国共产党人的自觉行动。

其二,娱乐文化、游戏文化、网络文化等快餐式大众文化越来越强力地控制着部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并抽掉其精神追求的内在丰富性。转型时期,传统社会精神文化被否定,新的社会主流精神文化尚未成熟,或尚未被社会广泛认同,社会非主流文化如娱乐文化、大众文化、快餐文化、网络文化等必然乘虚而入,充当人们的精神追求对象,中国共产党人也不例外。消费、快感、时尚等现代元素集聚在一起,加上网络化数字化的复制,同质化、庸俗化瓦解了高雅文化、精英文化,表面上形式多样实质上内容单一;表面上是强烈的道德正义实质上不过是泛道德化批判的情绪宣泄,传播的是道德悲观论的负能量。“当今中国人极其热衷于且习惯于‘批判’,然而,这种批判性思维自身又是需要进行再‘批判’的,因为该批判思维方式而非是以科学、理性、辩证的批判观呈现出来的,它更多地表现出表象化、情绪化和片面化,最终难免滋生出怀疑论和悲观论的严重社会后果。”^[9]在失去高尚性、丰富性之后的精神追求更显得浮躁、焦虑、迷茫、急于求成,也失去了理性批判的能力。“羡慕嫉妒恨”这个流行语,在一定程度上是这种被抽掉了精神生活的高尚性、丰富性之后的矛盾心理的表达。

其三,个性化诉求纠结着部分中国共产党人集体主义精神的大义。精神追求的个性化是现时代的一大特征,表现为个体感性的解放。如果说传统的精神追求表现为集体性主导甚至排斥感性个体。那么,转型时期的精神追求则表现为个体感性在拒斥集体性与理性的双重束缚之后的自我放逐。同样的给予,在集体主义看来是应该的,在个人主义看来是无道义。同样的结果,不一样的评价,这都反映了个性化与集体性的矛盾。个人兴趣爱好、多样性选择、不成熟的民主也会使个体疏离集体。社会转型对个体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理性的个体是生存活动的基本前提。个体想要有尊严地活着,“个体不得不面对稳定的压力,即不得不凭借个体的力量去解决不断变化的社会条件带来的不可预测性、非连续性和空虚。”^[10]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自我的自由发展与其他人的自由发展、个人个性化与其社会化、个体与集体理应是相辅相成、互为条件的关系。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

可能有个人自由。”^[11]但是,转型时期,个体所承受的压力与个体需求诉说着“真实集体”或“真实的共同体”的缺位或抗拒着不同形式的“冒充的共同体”的力量。

三、转型时期部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懈怠状况及其改变

以马克思主义信仰为核心的精神追求,一旦信仰主体心理失衡、信仰对象遭到误读和曲解、信仰主体的周遭环境出现不利于信仰的坚定时,必然会产生精神上营养不良即“精神缺钙”现象,一部分党员干部出现精神懈怠危机。究其原因,主要是“真信”的缺失。

通过对转型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追求面临的处境分析发现,“真信”的缺失主要因为:理论自身对当下中国社会解释力不够,部分中国共产党人对理论把握不彻底,精神不能摆脱物化的诱惑等问题,部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懈怠危机的克服,要对其精神追求内在结构,注入自律和他律的药。在当前语境下,坚定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要做到“顶天立地”,“虚实结合”。“顶天”,就是理论高度、理论自信。善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俯瞰中外古今,沿着历史的脉络走向未来。“立地”,就是把崇高的精神追求下沉到日常工作生活中,在日常工作中展现共产党人的精神面貌。尽管在精神上共产党人实现了对人类的终极关怀,但老百姓要的是终极关怀的当下利好,即当下的利益关照,这是他们的实惠。所谓“虚实结合”指的是理想与现实的结合,求真务实。如果说理想信念是务虚,那么实干则是务实。

1. 在历史逻辑中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完成世界观的彻底祛魅,辩证唯物史观是他的法器。在宗教信仰过程中,信仰主体不需要知性说明,把自我交给上帝,让上帝决断。马克思主义信仰则不同,信仰主体需要知性说明,是基于对人类历史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之后的接受、认同,并在实践中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解决现实问题。这必然需要信仰主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正确把握,而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关键在于“清晰把握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整体的主线,是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整体性的逻辑前提”^[12]。

“真信”还需要正确认识中国国情、历史发展逻辑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毛泽东反复强调,“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13]正是因为对中

国国情有着深刻认识和熟练掌握,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才找到属于中国的、唯一正确的革命道路。中国发展的理论选择与实践道路有它自身历史逻辑,五四时期,中国的出路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入场的契机。改革开放之初,贫穷落后的中国追问“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时期,为了建设公平正义的小康社会,党和人民思索“要什么的发展、怎么发展”的问题。从历史逻辑中可以看出,民族富强、人民幸福一直是共产党人精神追求的旨归。

转型时期,一部分人习惯把中国的现实与现在西方发达国家作比较,用西方的物质、技术及环境等文明的优势来否定中国道路、发展模式。这种简单的非历史的横向比较是其辩证唯物史观的缺失、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辩证唯物史观认为,历史发展有自身的规律,发展曲折性上升。那些质疑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人,是用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思维来评判中国发展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一方面遵循一般历史逻辑,同时在阶段性上又取决于中国内在的思想和实践,植根于中国文化。这种文化的产生,又取决于长期可持续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必须确立辩证唯物史观思维方式,以防掉进历史虚无主义以及西方中心主义的陷阱里。

2. 在日常生活批判中葆有精神追求的超越性

日常生活是中国共产党人重要的外部社会环境,对于外部社会环境的规约和改善,则意味着为党员干部精神追求净化社会环境,同时来自外部社会环境的监督更有利于共产党人自律。

日常生活涵盖了人的大部分存在方式和精神文化模式,是“以个人的家庭天然共同体等直接环境为基本寓所,旨在维持个体生存和再生产的日常消费活动、交往活动和观念活动的总称,它是一个以重复性思维和重复性实践为基本存在方式,凭借传统习惯经验以及血缘和自然情感等文化因素而加以维系的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领域。”^[1] 日常生活是个体除政治、科学、艺术、哲学等之外的活动,具有生活化、私人化气息,旨在维持个体生存和再生产。日常消费活动、日常交往活动、日常观念活动,这三者构成了日常生活的基本框架,完成个体生存和再生产。

转型时期的中国,日常生活的结构和精神文化图式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根植于农业社会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行为习惯等;二是以工业社会为物质基础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行为习惯等,两者共同构成日常消费活动、日常交往活动、日常观念活动的精神文化环境,与主体的特性相互作用,共同塑造

个体。日常生活具有生活化、私人化气息,从而使人的感性一面得到自然释放。因此,日常生活是一部分中国共产党人容易信仰迷失和自我迷失、自我放纵之域,同时也是老百姓能看得见的地方。中国共产党人回归到日常生活中,不继续坚守精神追求,而是沉溺于个人生活的琐碎中,这种沉溺对其精神追求崇高性和超越性产生的抑制作用。从这个角度讲,日常生活世界的内在文化精神对超越性起到一定的阻滞作用,其产生后果也是很严重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人在日常生活的不良形象引起老百姓不满意,甚至促使他们对党的执政合法性产生质疑。在日常生活中,对党员干部思想和行为进行规约,有利于由贴近人民群众,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从而提高他们的警惕性。

此外,当自我约束能力、外在软性监督不足以让一部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其精神追求时,硬性制度管理以及有组织的内部管理应当发挥强有力规制作用。

参考文献:

- [1] 胡锦涛.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2]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6: 82.
- [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4]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5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7: 329.
- [5]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第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137.
- [6] 邹诗鹏. 现时代精神生活的物化处境及其批判 [J]. 中国社会科学, 2007(5): 54-63.
- [7] 黄明理, 杨斌. 马克思主义批判观与泛道德化批判的反思 [J]. 南京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2013(4): 5-12.
- [8] 齐格蒙特·鲍曼. 被围困的社会 [M]. 邹建立,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15.
- [9] 吴远, 李秀娟. 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整体性的逻辑推进 [J]. 河海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15(1): 1-6.
- [10]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633.
- [11] 衣俊卿. 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 [M].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4: 33.

Predicament of Spiritual Pursuit of Chinese Communist During Transition Period and its Criticism/ZHANG Xiuqin (Wux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Wuxi 214121, China)

Abstract: The spiritual pursuit of Chinese Communist includes two dimensions: one points to the human ultimate concern and the other points to the reality of current concern. In practice, people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reality of ultimate concern, which determines the predicament of the spiritual pursuit of Chinese Communist during the period of transition: With regard to ideology, it is necessary to have theoretical consciousness and self-confidence. At the same time, it is compulsory to deal with non-Marxism or even anti-Marxism criticism. In view of individual existence, it is of importance to face with contemporary problems. Therefore, to cope with spiritual slacking,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Communist should stick to spiritual pursuit based on history logic and maintain transcendence of spiritual pursuit in daily criticism.

Key words: transition period; Chinese Communists; spiritual pursuit; predicament

Research into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of Cours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llege Students' Reception/TONG Man, et al (School of Marxism,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8, China)

Abstract: The teaching effect of the cours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ies does not entirely depend on the efforts the teacher makes. Actually it relies on the recep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recognition and applicability of the teaching content. In fact,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of the reception is the key point to the teaching process, which is the important prerequisite to make internalized teaching available. It is evident that ideological principles, political orientation and ethics advocated by the cours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ies should first be recognized and accepted by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n can be internalized as their own value system and behavior choice. Therefore, the research into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of the cours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ies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promo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ies.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and satisfaction of the acceptance of the courses, it is essential to study the factors pertaining to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of reception and the impact concerned.

Key words: cours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ies; reception;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Environmental Action in China: A Study of Literature/CHEN Tao (School of Law and Political Science,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China)

Abstract: Environment action, as an important social issue in China, has deep impact on social structure. The research topics concerning environment action in academic circles consist of the aspects of action predicament,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cultural and psychological factors, network and strategy and gender differences. Although the research into environment action tends to increase, it does not match the current increase of pollution cases and the relevant action frequency. Therefore, the study of environment action in China should be strengthened in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the theoretical study based on experience, the particularity study of environment action in marine pollutio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environment action and the follow-up study pertaining to anti-driving mechanism. In view of the deep significance of the issues involved, the research into environment action should be transformed from multidisciplinary one to interdisciplinary one.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action; literature study; environmental consciousness; network society; social structure

Research into Organizational Fairness, Social Support and Migrant Workers'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FANG Yanping (Law School,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8, China)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migrant workers in 2012, this paper uses the path analysis technique of SEM to research into the impact of organizational fairness, social support and migrant workers'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on migrant workers. Also, it discusse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laboring empowerment and organizational trust.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result, organizational trust and laboring empowerment are in a better position to account for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nd respond noticeably to the organization-staff interaction (i. e. organizational fairness and social support) . Moreover, organizational fairness and social support not only exert a direct influence on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but also exert an indirect influence on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through two mediators—laboring empowerment and organizational trust. The paper then proposes that actions should be taken to enhance migrant workers'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nd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given to the analysis of mediating variables so as to disclose the causality among variables.

Key words: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organizational fairness; social support; organizational trust; laboring empowerment; mediating variables

Role Analysis of Binary Dilemma of Community Committee: A Case Study of D Street in NJ city/YANG Wenjian, et al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8, China)